

主编

刘泽华



ZHONGGUO

中国政治文化丛书

ZHENGZHIWENHUA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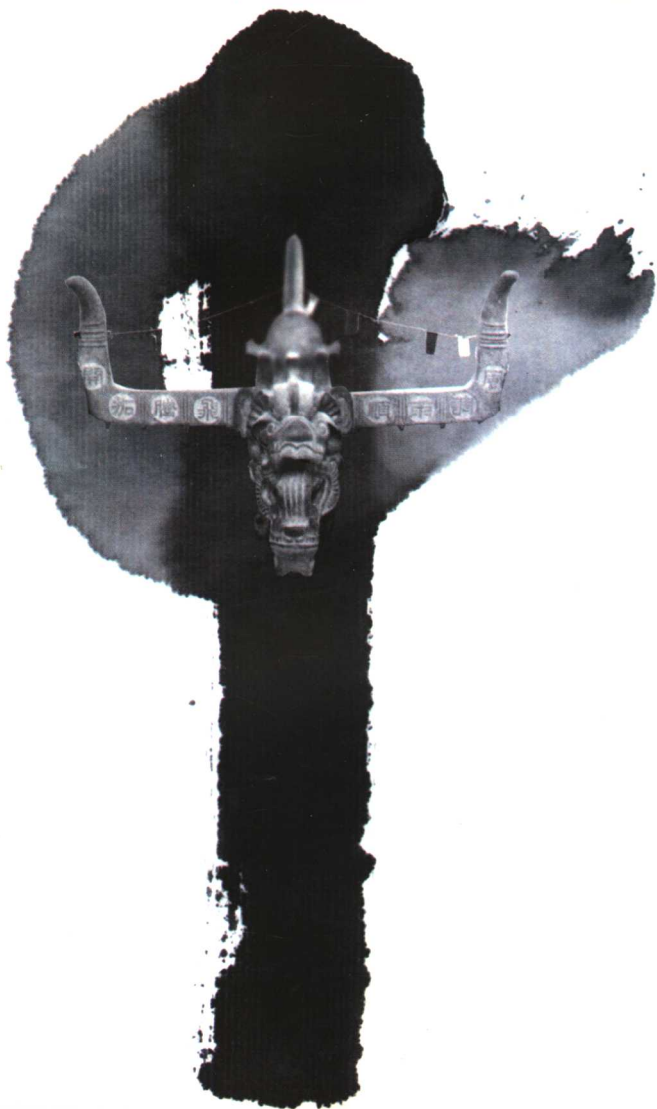
《立命与忠诚》

葛荃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立命与忠诚

——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



这些悲剧由巨人开始，被侏儒结束。

维克多·雨果：《九三年》

立命与忠诚

—— 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

葛荃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A08364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葛荃著.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
(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刘泽华主编)
ISBN 7-213-01803-5

I. 立… II. 葛… III. 士-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122 号

中国政治文化丛书 刘泽华主编

立命与忠诚

——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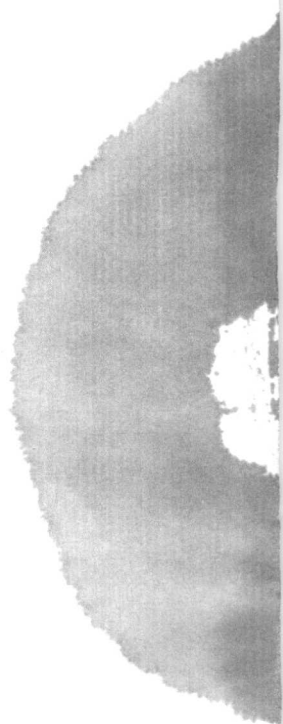
葛 荃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李 宁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校对 李育智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电厂路谢村)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1.8 万 插 页 2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803-5/D·273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国政治文化丛书

主编 刘泽华



序

说正题之前先讲明朝的两个故事。

其一，嘉靖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海瑞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直谏名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海瑞有一个震惊朝野的上书，言词激烈，充满了理性和胆识，对皇帝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评。嘉靖皇帝大怒，将海瑞下狱，拟判死刑。海瑞在上书之前已料到这一结局，早早把家眷送回家，遣散仆役，还买好了棺材。忽一日，狱主事设酒宴款待海瑞，他以为是临刑前的送别餐。由于他早已做好必死的准备，所以十分平静而坦然，痛快地大吃大喝一顿。饭罢，主事附耳告诉他：“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出即大用矣。”按常人的心理，听到这个消息，至少会松一口气。然而海瑞却转坦然平静为悲恸，如丧考妣，将酒饭全吐出来，痛哭昏厥，栽倒在地。

其二，东林党人是晚明极富学养和理性的士绅，又是儒家文化塑造出来的典型的正人君子。在晚明激烈的党争中，他们遭到阉党魏忠贤与嗜利官僚集团的攻击。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等得到熹宗的支持，大兴诏狱。面对“君命”之诛，东林党人不仅毫无冤屈之怨，反而担心有损君王圣名，一再表白“皇上圣明，臣罪当诛”。杨涟说：“涟以痴心报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雷霆雨露，莫非天恩。”高攀龙惟恐他人误解，在“遗表”中再表忠心：“君恩未报，愿结来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在死面前，没有一个揭发他人、推诿责任或称上当受骗的，而是一个

比一个铁骨铮铮，忠节烈烈，可谓感天动地，泣鬼神！

在今天看来，海瑞与东林党人的表现实在令人费解，这些人把自己的死置之度外，却为荒唐皇帝的声誉忧心忡忡，担心“徒使枉杀臣子之名，归之皇上”（杨涟语）。对这种现象很难用一般的历史研究方法说清楚，而用“政治文化”的方法则可以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关于它的定义迄今众说纷纭，但所要研究的内容又是清楚的，要之，是政治系统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或背景，即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于是有“传统”政治文化的提出。

当代政治文化属于一种行为科学，一般通过抽样调查、行为测量、心理分析、统计等方法进行研究。由于历史形态的政治文化的主体已消失，这些方法自然也难再使用，只能在历史的遗迹、遗物之中去寻找。

我不想先给“传统”政治文化下什么定义，而是先从问题出发，我认为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政治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信仰、心态和人格问题。这些无疑同政治思想史有极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政治思想史主要是解析政治理论，而政治文化则主要研究政治观念的文化结晶或凝固状态（如政治观念范式与情感信仰，成俗性的政治心理定势，无明确意识的政治行为准则，无须论证的当然前提，公认的政治形式、框框、套套等等）；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人格和政治心理等等。这些政治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一旦形成，常常成为控制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看不见的手。比如“君尊臣卑”、“君命臣从”观念，无疑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更是一个政治文化问

题。说它是政治文化时,指的是人们不再对它进行思考,而是把它视为“当然”的事实,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定势”,从而也就成为公认的价值准则。于是在君主面前就沒有任何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可言,在“圣旨”面前就没有是非可论,与“天子圣明”相对的是“臣罪当死”。许多历史现象很难用理性去分析,而用“政治文化”却很容易理解其中的蕴意。从海瑞和东林党人现象中可以看到“政治文化”的作用与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文化政治化与政治文化化。其主要目的是探讨形成“政治文化”的历史过程。

文化政治化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一定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有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其二,一定政治体制的存在和运行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仅仅从制度、法律、规定、强制等等范畴来谈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的运行和发展。以“权力”这一范畴为例,权力问题不仅仅是“硬件”的规定和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比如有关权力的合法性与对权力的认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文化问题。在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中,这方面的内容极为丰富。又如,儒家如何从“诸子”之学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文化政治化的典型事例。历史上文化向政治扩展、渗透的事实极多,均属文化政治化现象。

文化政治化十分重要,同样,政治又会文化化。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可以通过不断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例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皇帝至上观念,即绝对权威崇拜,就是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化的产物。相对强大的、圣明的君主权威,平民百姓显得十分渺小和卑贱,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参与意识,以致在一些场合,且不说面对皇帝,就是只要见到皇帝和皇权的标记,便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双膝跪下,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这种心理和行为

就是不断政治社会化的产物。

这套小系列书，就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而作的专题研究。这仅仅是开始，重头还在今后。我相信这几位作者以及有志于此的其他学人会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

刘泽华



作者简介

葛荃，教授。1953年生，安徽人。插过队，做过工。70年代末恢复高考，入南开大学读书，先后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术业专攻：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文化。已出版著作六种（独撰者一，合撰者五），发表论文三十多篇，愈知学无止境，曾杜撰治学箴言曰：“标新立异，自圆其说。”近年来于知识分子研究用功尤勤。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循道学旨 6

第一节 明代道学与东林学旨 6

第二节 公私辨与好名辨 38

第二章 东林志向 59

第一节 念头只在君父百姓上 59

第二节 成圣意识与戒惧心态 85

第三章 君子小人辨 107

第一节 人格认识的形成与政治人格分析 107

第二节 君子小人与政治运作 143

第三节 思维定式与结党相争 158

第四章 党议中的士人 182

第一节 生命与性格的史家笔触 182

第二节 书生意气干牛斗 199

第三节	进退取舍之间	218
-----	--------	-----

第五章	士人精神	249
-----	------	-----

第一节	内圣外王：着意追寻真、善、美	250
-----	----------------	-----

第二节	生命意识与生命价值	261
-----	-----------	-----

后 记	284
-----	-----

导 言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承传者。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士人一般以学习、研究儒学经典和传播儒家文化作为基本生存方式；以求取功名，居官从政，封妻荫子并光宗耀祖作为人生道路的最佳设计。

从历史的进程看，士人既是儒家文化的实际承载者，又是君主政治的主要参与者。随着汉代察举制、隋唐科举制等政治录用方式的完善，士人愈益深入地介入君主政治体制，成为官吏系统的主要成员，在政治运作中举足轻重。因此可以说，历史上的士人确乎处在文化与政治的中心地带，这是他们的历史定位。他们的所思与所为，就不能不带有生而与俱的政治文化意义。换言之，士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凝聚，这是他们的历史宿命。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士人是最有价值 and 最具吸引力的课题。

在今人看来，士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他们与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①并不相同。士人身负的文化内涵，诸如道德品性、理想信仰、人格特质、思维定式等等在长期的历史遭逢中，已经

① 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学界颇多争论。一种主要观点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作为“社会良心”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把文化关注置于社会关注之上；怀有无偿无私的“终极关怀”精神；在行为选择上，他们义不容辞地站在了批判席上。

融入了文化传统而符码化,它们并没有随着士人的消亡而寂灭,而是偕裹于传统文化之中延传下来。士人身上曾经具备的所有优长与拙劣、胆识与懦弱、精湛与平庸,仍然以各种形式和各种面目,不同程度地存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认真剖析历史上士人们的思与行,将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和认识自我的起步。

然而,中华数千年的文化承传,士人何止万千,漫漫一部政治史,一部士人从政史,究竟从哪里叙起呢?与其泛泛而论,浮光掠影,大而化之,不如把握典型,深入辨析,以见士人政治精神之一般。于是我选择了晚明东林党人作为剖析的对象,主要基于下面四点考虑。

一是明朝思想文化的发展最有特点。概括言之,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在明代中后期广为传布,与正统的程朱之学形成互峙之势。王门后学中又旁逸出泰州——李贽一脉,出现了平等化、个性化的思想趋势。再加上王学末流混迹于佛、道,晚明思想界实际呈现比较杂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东林讲学诸君宗极孔子,调合朱王,抨击佛老,修正王学末流之弊。他们以儒家道统的护卫者自居,代表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及正宗传统,很具有典型性。二是明代政治到了中后期,已是百病缠身,大凡在历史上所能找到的政治弊端,此时几乎备具。内忧外患,政以贿成,争权夺利,宦官擅政,加之矿监税使,民众抗争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社会冲突和政治矛盾的焦点,最后都集中在党争上,以至明亡之后,有人认为东林党人咎责难逃。^①那么,研究党争中士人的种种表现,揭示他们的观念与心态,考察其文化与政治价值就很有典型意义了。三是东林一派的核心人物,如顾

^① 据《东林列传·高攀龙传》“外史氏”曰:“说者谓汉家党锢四十年而黄巾起,党锢始解,然无补于汉室之亡。东林亦四十余年而闯贼犯阙,门户乃败,更无数于明社之墟。噫,是何言欤!”

宪成^①、高攀龙^②、邹元标^③、冯从吾^④、顾允成^⑤、赵南星^⑥等，均学有所成，领袖士林。他们从政能忠君爱民，清廉刚正，是士人之中“积极求道”的代表，展现的是士大夫的正面形象。与之相对，魏忠贤^⑦一派中的士大夫们则是嗜利小人的代表。通过对比分述，剖析他们的政治精神，不只是饶有兴味，而且可以将士人正反双方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以广今人闻见。四是东林党人的结局悲惨壮烈，天启朝两次诏狱，十数位东林君子做了专制王权的政治祭品。大限即至，生死之际，罹难诸君的思想、心态、情感最真实，最感人，使我们得以穿透历史的表象，真切地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体味其原本就有的凡人层面，从而为我们考察士人政治

①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无锡人，人称泾阳先生。万历八年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革职还乡，得到常州郡守欧阳东凤支持，重修宋儒杨时(龟山)旧讲院，是为东林书院。顾宪成集合同志，聚讲心性，为一时之盛。后病故。著作有《泾皋藏稿》、《顾端文公遗书》等。

②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一字景逸，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曾长期在东林书院讲学，声望极高。天启六年投水自尽。文集有《高子遗书》。

③ 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为东林首领之一。天启初受魏党攻击，辞官还乡，旋病故。著有《愿学集》等。

④ 冯从吾(1556—1627)，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曾与邹元标共建首善书院，讲学帝辇之下，与东林相呼应。天启五年削籍，旋病故，有《冯少墟集》。

⑤ 顾允成(1554—1607)，字季时，号泾凡，顾宪成胞弟。曾“举万历十一年会试”，殿试忤权贵，未成进士。后以讲官入仕。允成参与东林讲学，著有《小辨斋偶存》等。

⑥ 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号济鹤，高邑人。万历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为东林首领之一，与元标、宪成号称三君。天启中滴戍代州，病故。著作有《味槩斋文集》、《赵忠毅公文集》等。

⑦ 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人。万历朝入宫为宦官。泰昌元年(1620)熹宗即位，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旋又兼领东厂，势力大增，网罗党羽，专擅朝政。麾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等。是天启党祸之魁首。崇祯帝即位后，失势，后惧罪自缢。

精神提供了最佳脚本。

本书以“政治精神”为题。那么何为政治精神?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政治精神指的是理性思维的升华,是社会主体关于政治价值认识、政治伦理观念、政治意识及情感等在思想上的凝聚和提升。政治精神的表达可以通过话语,也可以通过政治行为或其他政治表现。政治精神一旦形成,对于认识主体的行为选择将产生强大的支配力。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人除了是一个身心相关的生物体和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之外,他还是一个精神的存在物。”^①如其所言,则精神是人之为人暨人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说,政治精神是人的精神的一个层次,那么,政治精神对于人的政治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把政治精神作为士人研究的切入角度,正是从士人政治存在的必要条件入手。这样一来,我们的学术视域就会从单纯的思想层面迈进一步,介入至东林君子们深埋在灵魂内里的精神底蕴,最终将制约着他们的政治存在及其行为选择的志向、观念、情感、心理等等逐一梳理出来。我们将要展示的可不是严肃深沉、不苟言笑的思想家,而是有血有肉、七情皆具的士人形象。

在方法论上,本书借鉴了现代“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理论,从政治价值、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态等层面剖析东林党人的精神内涵,并且将这种方法论与政治人格(political personality)研究结合起来。角度既新,则视野不同,必然能在前人耕耘过的土地上培育出新品种。如若从大处着眼,则迄今为止,人类认识的每一次跨越,都需要率先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若从细微处立意,则通过方法论上的些许改进与尝试,必能令我们对于中国士人政治精神的解读有所推进。另外,为了进一步开拓论域,我还借用了现代社会学的整合理论

^①《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7页。

和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某些观点。说起来似乎有些零杂，其实这正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合理途径——这个学科本身就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

历史上的士人是思想上的巨人，他们祖述尧舜、宪章汤武，自命为往昔圣贤的当然传人，研习经典为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而他们胸怀大志，或内圣，或外王，一心向往“为万世开太平”。正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人又是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尊师孔子，礼敬权威，奉行的根本价值准则是“尊王”，遵行的首要道德规范是“忠诚”。因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在无可抗拒的王权面前，他们总要跪拜阶下，以颡抢地。虽说他们有时也能做到直言敢谏，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会匍匐在地，口称“死罪”，坚信“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当然，也有的士人耽于利、权，或是老于世故，他们偏不要做巨人。有的竭力磨去棱角，有的则自甘下流，一心一意做侏儒。亦巨人，亦侏儒；有巨人，有侏儒；跻身士林者，何其哀哉！

“外史氏”陈鼎自述其作《东林列传》，“每多慷慨激烈之言，牢骚不平之语，怨天尤人之句。然不如是，则无以示劝惩，慰幽愤矣”（《东林列传·凡例》）。我读东林诸子遗卷，读《玉镜新谭》、《碧血录》等，深为东林诸君存心之光明正大，际遇之困顿坎坷，下场之哀凉悲壮而吁吁然，愤愤然，虽说不至于“怨天尤人”，但下笔失当之处，或者不免，唯幸读者识焉。

第一章

循道学旨

统观中国古代的士人,他们的人生出路在政治,安身立命的根基在治学。自汉唐以至宋明,学乃士人立身之本,概莫能外。具体到晚明东林人士,他们谋生计,求发展,别无他务,无不立足于学之一途。从现象上看,东林人士的政治活动轰轰烈烈,激荡人心;如若溯其根本,则东林党人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大抵肇源于学。因而,开篇伊始,我们首先要对东林一脉的治学旨要做一番探究,才好追根溯源,以揣摩东林政治精神的实质与内蕴,才好理出东林人格与政治实践的来龙去脉。

第一节 明代道学与东林学旨

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诸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考据学)。明朝初期的思想界正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明成祖永乐年间诏令编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标志着明代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崇敬与膜拜,可谓一揖到地,无以复加。按理说,程朱理学原本是民间学术,经由元朝仁宗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首倡,而升为官学,地位日隆。发展到明朝,三种“大全”问世,程朱之学的势位也可算是达到了顶峰。然而,继之而来的却不是程朱之学的进一步发扬光大。简言之,程朱之学虽然占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思想界,程朱一脉反而居于守势,他们虽有官学